

意大利的实用主义运动

乔瓦尼·古拉斯(Qiovanni Gullace)著

王成兵 黄煜峰 译

[摘要] 在意大利文化史上,实用主义是在实证主义的衰落与新观念论的兴起之间出现的一个短暂但重要的插曲。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曾经在意大利接触了意大利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中几位代表人物,并给予意大利实用主义哲学家很高的评价。意大利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乔瓦尼·巴比尼,詹姆士曾在《实用主义》中使用了巴比尼关于实用主义方法的比喻。杂志《列奥纳多》(Leonardo)是意大利实用主义的精神阵地。巴比尼和圭塞普·普利佐里尼等认为,传统的哲学总是关心如何去发现普遍真理和宇宙的抽象本性,它们消灭了人的活动。真正的哲学必须允许人改变和控制实在。现存的哲学体系更在乎原则而不是人的需要,它们无法给人提供力量。只有实用主义才能够激发人去行动,行动的结果就是力量,而人借助于力量成为类似于上帝那样的存在物。乔瓦尼·瓦拉蒂和马里奥·卡尔德罗尼则是意大利实用主义运动中的另外一种风格,代表着另一种方向。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是关注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家,他们通过理性的冷酷的双眼去审视新的学说,努力通过逻辑的作用去寻找区分真假的恰当标准。

[关键词] 实用主义;意大利;威廉·詹姆士;乔瓦尼·巴比尼;《列奥纳多》

[作者简介] 乔瓦尼·古拉斯(Qiovanni Gullace),曾任美国杜兰大学教授;王成兵,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山西太原 030006;黄煜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 B0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20)06-0037-09

在意大利文化史上,实用主义是实证主义^①的衰落与新观念论的兴起之间出现的一个短暂但却重要的插曲。实证主义统治了1870年到1900年间的意大利哲学界,而新观念论^②则在自20世纪第一个10年以来的意大利思想界占有主导地位。20世纪初,当实用主义学说首次出现在意大利哲学界时,持对立立场的实证主义与观念论吸引了专业哲学家们的兴趣,他们努力为哲学问题的解决寻找统一的原则。然而,当时所有的哲学体系都无法满足大多数意大利学生的理智需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秉性。实证主义把人拴到“事实”的链子上,观念论把人还原为绝对理念的

单纯属性。因此,自由、创造性和创新性似乎在实证主义和观念论中几乎找不到位置,它们甚至无立足之地。

这样,实用主义一度被年轻和不羁的知识分子尊为一种解放的哲学——把人从伤害着学术界的体系性学说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意大利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拥护者是乔瓦尼·巴比尼(Giovanni Papini)。巴比尼才华出众,他坚决地反对任何可能限制人的理智活动的哲学体系。在那个时候,巴比尼认为他的任务是改变世界,而为了给这种认知找到根据,他要寻找一种驱使人去行动的哲学。在巴比尼看来,坚持信念的意志、对力量

[基金项目] 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威廉·詹姆士哲学文集》翻译与研究”(17ZDA032)

^①当时的意大利实证主义是由罗伯特·阿迪格(Roberto Ardigò)系统化并凝结成一个单独的学说的,他深受斯宾塞和孔德的影响。

^②当时的意大利观念论的代表人物是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

的承诺以及把人作为宇宙中心看法的实用主义，最合乎他的需求。

很快，在巴比尼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人，他们把巴比尼拥为领袖。1903年，这些人在佛罗伦萨创办了杂志《列奥纳多》^①(*Leonardo*)，该杂志成为充满战斗精神的意大利实用主义阵地。那些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对意大利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不满的人们，马上在这群实用主义者中找到了知音的感觉。

1905年春天，在意大利出席世界哲学大会的詹姆士在给夫人信中写道：“今天下午，我与‘实用主义’小组有一个很好的且亲切的交谈，这个小组的成员有巴比尼、瓦拉蒂(Vailati)、卡尔德罗尼(Calderoni)和阿门达拉(Amendola)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住在佛罗伦萨，自费出版月刊《列奥纳多》，开展了一场非常严肃的哲学运动。他们确实明显地受到席勒和我的影响(在此之前，我根本不敢相信这一点)，他们表现出一种热情以及文字上的冲击力和活跃性。在我们美国这块土地上，我没有见到过这些东西。”^②

詹姆士把意大利的实用主义当即评判为一种“严肃的运动”，这一点被证明为多少有点不正确。事实上，这段对于实用主义的集体性热情是与《列奥纳多》1903年到1907年间的状态相重合的。在这个时期，实用主义运动被个人依据自身的品味和目的而变换成不同的偏好。当时，没有人做过认真的尝试，去把这个新学说体系化或将之组织为一个具有简明规定性的理论。由巴比尼撰写、詹姆士和柏格森作序，原计划于1906年以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同时出版的著作《实用主义》，直到1913年才问世^③。这本书成了对过去的记录，而不是对观念的一种专业性研究。由于实用主义中蕴含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它逐渐地分裂了。这种个人主义带来的极端结果是，它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真理标准，并使得对理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流于纯粹的任性。实用主义的大多

数追随者在其他的学说中寻求世俗的港湾，以规避来自非理性主义与独断论的风险。对于他们来说，实用主义不过是心灵的暂时性状态，这种状态来自一种深层的理智上的不满意，来自对文化复苏的渴望。它代表了一种狂飙，在其中，信念的意志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尽管意大利的实用主义运动相对“短命”，但是，它为评估作为一种哲学学说的实用主义提供了很有趣的和很重要的解释与发挥。就笔者所知，对于这个美国思想产品的意大利“分店”，人们在英语世界中讨论极少^④。因此，本文旨在对意大利的实用主义及其特质提供全面的和综合性的看法。

早在1902年，巴比尼就对实用主义这种新哲学产生了兴趣。在其一篇向意大利人类学学会宣读的论文中，巴比尼捍卫了某些实用主义原则。1903年底，巴比尼在《列奥纳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哲学的死亡和再生》(Death and Resurrection)的论文，该论文为意大利的实用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在这篇文章中，巴比尼分析了哲学的目的。他得出结论说，哲学的原理如果有价值，必须旨在给人类这种本性上是有活动能力的存在物提供做和创造的手段。在他看来，传统的哲学总是关心如何发现普遍真理和宇宙的抽象本性。不过，由于哲学家都是根据其个人经验、情感和感受去思考事物的，他们无法对普遍真理进行理性的界定。这样，哲学中主体的经验、变化的感受性、理性和普遍性都无法存在了。另一方面，概念无法解释实在，因为概念的本质是外在地规定的，而实在总处于变化之中。依据一些固定的原则去统一和解释具体的实在的倾向，导致了把人作为被动的存在的看法。因此，传统的哲学消灭了人的活动。真正的哲学必须允许人改变和控制实在。现存的哲学体系更在乎原则而不是人的需要，它们无法给人提供力量。只有实用主义能够激发人去行动，行动的结果就是力量的产生，而

①《列奥纳多》刚出版的时候设有专栏让作者表达对理智解放、极端个人主义、普遍价值观的渴望，显示出吸收了尼采思想灵感的观念论者倾向。它的拥护者中的大多数关注文学和艺术，很快转向实用主义，因为实用主义最适合于满足他们的审美和理智灵感。

②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专门针对这个论题写作的英文论文只有威廉·詹姆士的《巴比尼和意大利的实用主义运动》，载《哲学研究》(*Journal of Philosophy*)III, 13(1906)，以及卡罗·高利诺(Carlo Golino)的《巴比尼和美国实用主义》(Giovanni Papini and American Pragmatism), *Itaica*, XXXII, 1(1955)——译者注。

人借助力量成为类似于上帝那样的存在物。在巴比尼看来,这就意味着力量对于实在的最高程度的成就,因而是灵魂的完美和谐的实现。全知全能因此是欲望、绝对的平和、一种形式的神圣死亡的完全的满足。

“人-神”是巴比尼实用主义中理想的人。巴比尼的论文《从人到神》(From Man to God)给人留下一印象:年轻的巴比尼一定曾经遭遇过极度的刺激。尽管如此,威廉·詹姆士仍对他的看法表示出一种充满好奇心的热情,并且认为“人-神”的设计是最伟大的哲学类型中的一个^[5]。在给席勒的一封信中,詹姆士说:“巴比尼是一块宝石!想想看,这个意大利小伙子仅仅跨出一大步,便让自己领先于我(通过他的人-神,甚至也领先于你)。这是一个怎样的作家啊!多么多产!”^[6]很明显,不是只有巴比尼才处在那神圣的疯狂之中。

因此,意大利实用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人凭借它能成为一个“神”。巴比尼并不试图定义这个新学说,并且坚持认为对它的定义只可能部分正确和不完整。“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他说,“实用主义更是一种无需哲学的‘做’的方法”^[5]。此外,在巴比尼看来,并不存在实用主义,只存在实用主义的思想者。并且,进行实用主义思考的原因有许多:第一,实用主义者能通过回避不可解决的问题而节省时间;第二,他能从成为他自己世界的创造者的感觉中享受到精神上的愉悦;第三,尽管实用主义自身并不是形而上学,但它给所有形而上学中道德的和美学的享受提供了空间。巴比尼预见到,注重实用的人们和梦想家们将会接受实用主义,前者能在其中为他们蔑视的一些缺乏实际意义的问题找到正当的辩护,后者能在实用主义学说中找到实现他们强烈愿望的唯一路径。实用主义似乎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庇护所——除了那些构建体系的人、热爱抽象的人、寻求绝对和普遍的人。它就像是酒店的一条走廊,一个人必须通过它才能到达自己的房间,在房间里他可以成为一位无神论者或一位信徒,一位科学家或一位诗人。

巴比尼强调和发展了这个新学说的哪一方面呢?巴比尼的想法与被他视为大师的詹姆士的想法区别何在?巴比尼把实用主义分为了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关乎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并且强调意义问题,这个问题导致用某个理论的特殊后

果来界定理论;第二个领域关心的是根据能达到的目的来选择哲学问题;第三个领域强调确信和信念对真理与行动的影响,巴比尼主要对这一特别的领域感兴趣,而且,他在这里对实用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他看来,信念、行为以及知识是紧密相关的。关于某一个确定事物能被实现的信念,影响到我们对它的知识。从一个人能对某一事物采取行动的信念,能得出它存在的确定性。而且,一个人认为对特定事物类型采取行动比对另外一些类型采取行动更简单的信念,会导致他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强烈地影响到他的认知。如果知识真的是力量,那么,力量也同样是知识。这个特征也是巴比尼对实用主义的创新,是其他意大利实用主义者所缺少的。

巴比尼深挖的另一个问题是感受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把某物当作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真的那样去行动,这能创造出认为某物确实是真的那样的信念(帕斯卡)”,他说,“这个事实是在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信念之间的一系列关系中的一个特殊例子”^[6]。这样的探究使他梦想创造一种新的艺术,通过它,人们可以随意修改和控制我们的心灵。巴比尼由此转向了詹姆士提出的“信念的意志”问题,并为之提供了一个更详细的解决方法。他认可信念会影响实在并且“对事实的信仰有助于创造事实”。不过,在创造事物的方式上,他与詹姆士有不同意见。按照巴比尼的看法,信念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经由行动进行创造的。在詹姆士的观点中,信念并不改变事物,它只是改变我们对它们的态度。对巴比尼而言,信念的确改变实在:我们相信并且我们行动;我们行动并且我们改变。这样的改变因此是真实的。行动不仅仅帮助我们塑造对这个世界的态度,而且也塑造这个世界自身^[7]。

巴比尼的实用主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的一些想法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只停留在粗略勾勒阶段。他的哲学从来不成体系,只是一个时常会自我矛盾的心灵的连续状态。巴比尼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他后来成为了天主教徒。在七十多岁时,巴比尼写了一本为“魔鬼”辩护的书,其中尼采的权力意志、詹姆士的“信念的意志”以及作为某种内在于我们且可为我们塑造的实在的想法,都成为了滋养这个无政

府艺术家的灵魂的元素。它们构建了巴比尼的实用主义,他把这种实用主义定义为“魔力的”或“心理的”。

就重要性而言,意大利实用主义者中与巴比尼几乎齐名的第二号人物是圭塞普·普利佐里尼(Giuseppe Prezzolini)。圭塞普·普利佐里尼积极参与《列奥纳多》的投稿,对塑造和阐明巴比尼“魔力的实用主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普利佐里尼是柏格森的学生和 F.C.S. 席勒的狂热崇拜者,由于其为《列奥纳多》写作的文章而在《列奥纳多》拥护者中的地位得到了清楚的显露。在这些文章的某些例子中,他似乎预示了巴比尼的某些观念。在 1903 年 3 月出版的《列奥纳多》上,赞扬了人的无限可能性——真理的创造者、世界的主人,并预示了巴比尼三年后出版的对此有更详细说明的文章《从人到神》(Dall'Uomo a Dio)。普利佐里尼对逻辑思维和逻辑学家的抨击^[8],表明了他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他把 F.C.S. 席勒推崇为“许多枷锁的解放者,众多偶像的破坏者”^[9]。然而,普利佐里尼并不像巴比尼那样更向往成为一个神,他仍然紧紧依附于 F.C.S. 席勒的人文主义,强调真理具有的与人有关的特性以及人作为世界尺度的智者观点。“实用主义被他转化为一种世故的机会主义和一种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一种在一个人的生活中获得满足的方法,一种通过他伙伴的幻觉和偏见去控制他们的方法,这就像宗教骗子、庸医或修辞学家所做的那样。”^[10]事实上,人们能在普利佐里尼的《劝说的技艺》^[11](L'Arte di Persuadere)(1907)中找到他思想中一个最有趣的特点。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词”在动摇人的思想时的重要性。因为人是真理的创造者,他就有可能让其他人相信他所希望的任何东西。普利佐里尼说,词并不能像把某人自己的智力灌输到另一个人的智力中的手段那样,对听众采取行动。词是一种激发意志的手段,它不体现真理。一个美丽的比喻比一个完美的三段论更有说服力。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产生信仰和激起意志,那么,他就具有说服力。词的美和说服他人的艺术(为了比他们得到更多的权力)表现了审美的秉性。本质上,普利佐里尼的《劝说的技艺》似乎是一个给专业撒谎者使用的精美手册,并且也被实用主义者群体

中另一位杰出成员瓦拉蒂贴上了这样的标签^[12]。

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都倾向于对理性和智力的力量表示怀疑,对创造出人们赖以生存的真理的信念的力量表示乐观。通过这样的态度,两人选择并发展了包含在实用主义中的非理性种子。在皮尔士和杜威那里,真理具有客观性的特性;在詹姆士和 F.C.S. 席勒那里,真理尽管是个人的,但也有一种人类的功能;在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那里,真理仅仅是主观的或个人的。真理的效用可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对功利主义者而言,真理的效用在于命令,因此它可以维持权威;对于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它会藐视真理并不受它的束缚。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分享着后一种信念。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去做无用的事,恰恰因为它是无用的。詹姆士清楚地理解这种实用主义的本性,并在刊登于《哲学杂志》(1906)的文章中写道:“巴比尼和意大利的实用主义者运动,即这种倾向于作为她(意大利)的标记的个人主义,开始像过往一样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且在哲学中的标志最显著、最广泛……意大利实用主义是无与伦比的激进。”^[13]

由于乔瓦尼·瓦拉蒂(Giovanni Vailati)和马里奥·卡尔德罗尼(Mario Calderoni)的努力,意大利实用主义在另一方向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在气质和理智方面都与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有着很大的不同。当他们都属于《列奥纳多》团队时,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与他们的朋友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在学说上存在着分歧,并且,他们反对后者的非理性倾向。瓦拉蒂是一位有广泛科学兴趣的数学家,卡尔德罗尼则在法律方面有造诣并精通政治经济学、哲学和心理学。他们的逻辑实用主义在一些基本问题和目的上与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有差异。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是在实用主义学说中寻找能满足他们美学需要的艺术家;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则是关注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家,他们通过理性的冷酷的双眼去审视新的学说。前两者把意志视为信念的创造者,后两者则把信念视为意志的创造者。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在他们的实用主义中寻找成为神的方法,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则在其中寻找区分真假的恰当的标准。在卡尔德罗尼看来,真正的实用主义是一个逻辑的工具,一种实证主义

的完美形式,它旨在澄清理论的意义并清除那些与我们的真实世界并不相关的哲学问题。结果,它与信念的意志这个危险的理论处于公开的冲突之中,后者出于享乐主义的原因,对什么是好的关心超过了对什么是真的关心。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在实用主义中看到了信念的意志的学说,看到了人类对世界的无限力量的肯定,看到了“人-神”的承诺,还看到了它那激发人心的、创造性的和魔术般的方面。相反的,瓦拉蒂认识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实用主义,即逻辑的和魔术的,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两种倾向的密切关系和它们相互的关联之点确证了一个统一的派别。很明显,卡尔德罗尼和瓦拉蒂更倾向于皮尔士的学说而不是詹姆士的。人们或许会说,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之于卡尔德罗尼和瓦拉蒂,就像詹姆士和席勒之于皮尔士和杜威。

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的出发点是探究实用主义的真理标准。实用主义者似乎在原则上同意,一个观念的真理必须根据它的实际后果来定义。但是,有两种理解这些后果的方式:一种过于狭隘,一种过于宽泛。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有用的后果”就是能满足有机体,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理同一于生物的效用——这将使实用主义变成人类对精神愿望的一种对抗。在第二种情况下,从一个观念中得到的任何满足的形式都是它的真理性的标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效用”一词必须在一个一般意义上使用,它与附属于它的真理的相关特征无关。这种解释会导致混乱,它让个人有权声称任何能满足自己的观念都是真的。此外,还存在很多无法被证实的有用观念。那些拥有一个有用的但不能被证实的观念的实用主义者要面对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么必须放弃进行这个证实的要求,要么改变效用的标准。人们已经作出了许多尝试来调和这两种观点,但是都未能取得成功。詹姆士主张,使一个观念为真的效用在于这样的事实:这个观念会成功地引领我们走向某种经验。“成功地引领”蕴涵着某种特定的满足,即这个观念的源初的意义和我们信念的对象,但这种满足需要被引领着走向它的时候才能被体验到。然而,詹姆士的“引领”见解过于模糊,而且也没能提供证实真理的明确标准。席勒更明确地断言,那些证明了一个观念的真理性的满足是一种特殊的满足,这种满足在这个观

念达到它的计划所蕴含的对象时会被感受到。但是,他承认存在着其他不属于这个计划的满足,这使得真理的标准更加混乱不堪。在这一点上,杜威要比詹姆士或席勒都更为清楚。在杜威看来,一个观念蕴含着一个计划或行动的规划,而且,观念的真理性的标准必须在这个计划的实现过程中寻找。如果效果符合预期的变化,那么这个观念是真的;所有其他的考量对决定观念的真理性的任何价值都没有。因此,杜威构想了“真理的可预言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观念是通过它所预期的后果而成为真的。不过,这样的观点最先是皮尔士勾勒出来的,然后在杜威和米德的芝加哥学派那里得到了发展。由于这样的发展并不是那么清晰,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试图对此加以进一步阐释。

甚至在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了解实用主义之前,他们就在作品中表示了对观念的后果,尤其是构成了观念的真理性的标志的特征的兴趣。当他们发现皮尔士的学说时,他们开始发展它并澄清其看起来晦暗不明之处。如果一个理论的价值能被它导致的实际后果所决定,那么,哪一种后果才应该被视为是有效的?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选择了那些逻辑的后果,断言只有它们才能被作为真理性的标志。在他们看来,心理的后果对这个目的没有效果。每一个理论都暗示着对某事物的预知或预测,如果没有这样的预测,真理和谬误就没有意义了。只有预测才允许我们控制一个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后果。对我们所预知或预测之事的证实必须总是直接的。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强调直接证实的可能性,即使它看起来实际上不大可能。他们认为,超出了直接证实的范围就没有判断。因此,为了把有意义的东西从无意义的东西中区分开来,以去伪存真,其他学科都研究的预知和证实的原则被引入哲学学科中来。证实性原则将拒斥哲学问题中大多数传统的套话并给予哲学最完整意义上的科学特性。但在这一点上,一个困难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关于理性知识的问题。理性知识是否蕴涵着预知?使得理性知识为真的东西是什么?席勒和詹姆士曾面对着数学真理的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地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对于詹姆士来说,数学断言的真似乎不依靠感觉经验,它们的真理性的建立在范畴的本性基础上,这些范畴能在它们的相

互关系中得到考虑。在数学中,心灵的任意创造性建立了公理,这些公理的真理独立性于证实。很明显,这种观点违反了要用后果进行证实的实用主义原则。席勒坚持认为,数学的真理依赖于实际后果,并因此误解了数学真理性的基本性质,即詹姆士所认可的独立于感觉经验的特质。在实用主义原则的精神中去面对数学的真理,似乎极为困难。那么,一个人如何才能在一个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中调和任意的和可证实的东西呢?

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可以为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解答。一个断言的意义和真值是由它与作为其一部分的系统的关系决定的。一个短语或一个词所属的语境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断言从一个心灵的语境转移到另一个语境时,它能彻底地改变它的意义。一个移动的物体的意义在工程师心目中的意义大不同于它在天文学家心目中的意义。工程师与天文学家各自期待着不同的后果,并且使用着不同的证实标准。数学公理没有通过“天赋的权利”而拥有任何真理。它们只是被科学家选出来作为有用的基础,据此,科学家能得到他想要的推论。当我们转向对一些我们能证实的预测进行说明的时候,它们的真理性问题就出现了。在这一点上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这两位逻辑学家的看法,我们的知识系统并不仅仅是由可证实的命题组成的。我们的心灵活动自身也体现在表达人类欲望的“价值—判断”中,可证实的预期与“价值—判断”在我们心灵生活中混为一体。在每个概念、定义、理性原则或科学公理的源头,都有一种融合在“价值—判断”中的主体性活动。这种主体性活动构成了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所谓的“在我们心理生活的运作中任意的”^[14]东西。但是,一个公理的“任意”选择并没有赋予它“真实”的头衔。对一个定义的选择仅仅表达了我们把一个名字安排在一类对象上以便把它们与其他的种类区分开的意愿。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只有通过人类的目的、意图才能确立起来。如果一个公理或一个定义是被任意地选择的,那么,只有在它带来某些预期的后果时,它才是真的。我们任意选择的东西就其自身而言既不真也不假,而是作为一个能证实的事实后果才变成真或假。因此,证实的原则限制并控制了“任意性”。

然而,我们任意选择的决定性原则是什么呢?

按照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的说法,它是思维经济原则。我们试图通过最简单的假设去进行预见和预测,我们的选择在其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预见这个意义上是好的;它们之所以是真的,是因为它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心灵生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任意的行为的事实,并不能减少知识的价值。从长远来看,知识要依赖于某些独立于我们的事实,而“任意性”引领我们走向这些事实。

“任意性”根源于权力意志,后者意在统治自然并为这个目的寻找最好的手段与最经济的工具。权力意志的目的与科学自身的目的相重合,它意在掌握更确定的预知,更准确和更持久地获得知识的方法,以便控制自然^[15]。

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的实用主义是在拼命捍卫“被证实的预测”。这个原则被视为真理的唯一可能的标准。他们构建这个原则并把它扩展到生活的每一方面。卡尔德罗尼把它应用在犯罪学的责任观上;瓦拉蒂把它用在宗教和道德信念上。法官们在惩罚罪犯时所考虑的责任原则立足于如下的事实:人的行为源于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后果的预期。对坏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的恐惧,是避免这些坏的行为的原因之一。刑事处罚正是建立在这种恐惧的基础上的。这让人想起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实用主义法理哲学。

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的实用主义的原创性在于,它断言一个信念的效用并不是它的真理性的标志。一个信念要成为真的,必须要制造它所预见的那种效果,它的后果必须是那些被预期的东西。真理的最确定的标志是被预期的东西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符合。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从这个观点出发评估了哲学的意义和重要性。他们强烈反对寻找越来越普遍的概念的倾向,强烈反对寻求那些超出了研究的有用性的关键点的倾向。哲学不要去关注无用的原因和解释,而是揭示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事实如何并且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传统的哲学用目的取代了手段,相反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让哲学的一端联系着科学,另一端联系着生活。哲学的任务可比作磨刀匠的工作,磨刀匠的工作只是让刀更为锋利,而不关心人们如何使用它:究竟它是在一场手术中帮助医生挽救一条生命,还是在一场谋杀中助

为虐,让凶手毁掉一条生命,都不那么重要。哲学家必须提供达到某些目的的手段。

瓦拉蒂和卡尔德里尼的实用主义毫无疑问远比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的理论重要和严肃。不幸的是,这两位学术观点相同、合作密切的逻辑学家并不是很长寿,他们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一直在写一本将会给逻辑实用主义以一种有机形式的书。然而,瓦拉蒂于1909年的去世使得这项工作戛然而止;卡尔德里尼于1914年去世,年仅35岁。他们的作品后来被收集和出版,但是,人们对实用主义的兴趣很快就彻底结束了。这些作品^①成了一种严肃的尝试,力图去面对和解决实用主义哲学家仍未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多次引用巴比尼的理论并给予他很高评价的詹姆士却从未提及瓦拉蒂和卡尔德里尼。詹姆士对意大利实用主义的误解明显体现在他把巴比尼的计划评价为表现了一种“严肃的运动”,他未能分辨出他们对实用主义学说所作的更有效的贡献。他没能理解,巴比尼等人的脾气决定了他们对实用主义几乎没有哲学的兴趣。巴比尼的主要关注点是文学和艺术,是一种在实用主义的某些观点中找到其自身理由的晚期浪漫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史家已经间接地纠正了詹姆士的判断,让瓦拉蒂和卡尔德里尼获得了在实用主义运动中应有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们降低了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那些嘈杂的理论的重要性。

无论是巴比尼和普利佐里尼领导的“魔术”倾向,还是瓦拉蒂和卡尔德里尼领导的“逻辑实用主义”倾向,都没有机会在意大利的文化氛围中深深扎根。人们从天主教和观念论这两个批判路径去对待这种新哲学。特别是,詹姆士学说中含有宗教性,这使其能适应天主教教会中的现代主义运动。现代主义的目的是与天主教正统、现代科学相调和,现代主义者在实用主义的某些环节中找到了对他们学说的支持,也就是说,通过它们对我们尘世生活的幸福影响,找到了一种证明上帝存在、天意和灵魂不朽的手段。他们从中找到了一个广阔的方案,在其中,科学和宗教、人类和

神圣者都可以和谐相处。但是,因为现代主义总是受到教会的责难,天主教对意大利实用主义的评价持一种谨慎的观点。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和对现代主义运动的强烈同情者,亚历桑德罗·基亚佩利(Alessandro Chiappelli)在他的《现代思想的危机》(La Crisi del Pensiero Moderno)(1920)中指出了实用主义对生活 and 思维中更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不足之处。他认识到实用主义在对独断论体系的反叛中体现出的思辨精神的独创性。他在实用主义对意志的原始地位的强调中、在赋予感情的和激情的生命力量的角色中,看到了意大利实用主义具有的超越单纯功利主义的观念论倾向。然而,在基亚佩利看来,按照严格的天主教观点,詹姆士学说的弱点在于它复兴了万物有灵论和多神论,而这种复兴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的退步,因为宗教良知已经在一神论中达到了它进化的最高点。根据基亚佩利的说法,尽管实用主义具有这个缺点,但是,试图完善科学并为宗教进行辩护的实用主义是一种讨论信仰和感受性的哲学。实用主义对于在否定不可知论之后建立人类的各种平衡,是必要的。

而对实用主义学说的强烈反对则来自观念论哲学家们。克罗齐和詹蒂莱(Gentile)对那些与他们自己的体系相冲突的实用主义原则持有异议。克罗齐确定,实际的活动预设了理论活动,意志不可能离开知识。在《实际的哲学》(1909)中,克罗齐断言,那些用于主张理论活动依赖于实践活动的论证,仅仅表明精神功能的统一性和意志力量对认知心灵的健康而言的重要性。但是,在克罗齐看来,真理是意志的产物这个论点仅仅是一个建立在“产物”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的诡辩。他认为:“用意志去协助思想的运行是一回事,但要用意志去替代思想的运行,则是另一回事。”^[6]这种替代意味着,否定那种应该被协助的力量。在这方面,实用主义被他视为是对怀疑主义的一个公开的宣告,一种对真理以及对获得它的可能性的不信任。然而,实践的活动预设理论的活动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前者没有后者重要。“知识为生活服务”,克罗齐断言,“并且,生活服务于知

^①瓦拉蒂的作品被收入《文集》的厚厚一卷中,由卡尔德里尼编辑,1911年在佛罗伦萨-莱比锡出版(Florence-Leipzig)。卡尔德里尼的著作被收入《文集》的两卷中,由坎帕编辑,巴比尼作序,1924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由罗西筹备的第三卷未出版。

识:那沉思的生活……必须导向活动,而活动……必须导向沉思”。从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的联系中,一个人可能获得“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它是实用主义者们从没想到过的,或者至少他们还未能把它从其他实用主义中区分出来并给予其价值”^[17]。克罗齐的批评主要针对旨在给个人一种创造其自己的真理的任意权力的实用主义。

詹蒂莱对实用主义的批评《作为纯粹行动的心灵理论》(1916)直接针对否定了知识的认知特性的实用主义学说。他不能接受数学的和自然主义概念的“实际”性质,他拒绝如下假设:这些概念从它们所服务的有限目的中获得它们的价值,并因此不是变成知识,而是变成了符号,变成其有效性不一定被意愿所规定的约定性结构。对于詹蒂莱来说,有用性不是真理的标志;一种认知仅仅在它是真实的这个情况下才是有用的。詹蒂莱把实用主义与中世纪的唯名论相提并论,并指出唯名论至少坚持概念对个人知识的必要性,而实用主义拒绝了知识的普遍性特征并且假定个人知识是知识的唯一形式,这种知识被设想为当下的直观。在詹蒂莱的观点中,“最为困难的是去证明,思想——尽管它能通过简单直观——能够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实际上是个体的、并没有被普遍性的亮光照射的对象上”^[18]。不可能获得没有普遍性的个体知识,实用主义的错误在于它无法构想普遍性与构成真正个体性的特殊性的统一。詹蒂莱从这种作为他“实际的概念论”的基本原则之一的统一性出发,讨论实用主义学说。

安东尼奥·埃利奥塔(Antonio Aliotta)在其《观念论对科学的反对》(La Reazione Idealista contro la Scienza)(1912)中更广泛地处理了实用主义。他的批评特别针对那些对物理秩序的客观性所作的实用主义的否定。他指出,实用主义把认知功能还原为实践功能并把知识还原为行动的努力,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认知的做并不是实践的做,就像它不是艺术的做一样。既然我们在理论功能中能有意识地反思到某些独立于我们主观行为的东西,那么,认为客观实在性是一种感觉的无定型的不稳定状态或可塑物质的信念,似乎与人类的经验相违背。我们的行动总是与外部的障碍相遇,表明这个世界并不是可塑的。事实并不是我们意志中的样子,它经常避开我们的

意志并拒绝充分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行为是实在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实用主义者多次强调的成功预测,在现象中预设了一种确定关系的持续性,而这种关系是无法被意志所更改的。有机功能的发展和有用的习惯的建立,都需要某种在一定环境中的坚持。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那么,“有用的”这个词就变得缺乏意义了。进化论的原则预设了一种“真实的”有机结构和一个生命不能创造而只能适应的情境。“盲目和独断地接受了生物起源和生命意义的实用主义,当它否定所有自然选择的预设,即否定物理秩序的时候,它便在与自己假设的矛盾中终结了。”^[19]塑造实在的任务并不完全在我们手中。这个世界以我们必须转而顺从地屈服于它为条件,才允许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它。事物有其本性,它们的行动被一些规则所支配,而这些规则不是我们所制造的,却必须由我们主体行动去寻找和认可。

吉多·德·鲁杰罗(Guido De Ruggero)在其《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1912)与乌戈·斯皮提奥(Ugo Spirito)在其《当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Il Pragmatismo nella Filosofia Contemporanea)(1920)中作出了相似的评论。不过,他们承认,实用主义学说表达了某些现代哲学的基本方面,即对真理的人类特征的主张,对一个完美的和已经完成的实在的否定,以及对一种一劳永逸的科学的否定——这些成分现在似乎已经渗透进了一些被认为是远离实用主义的观点中。这些表达是实用主义的优点。

总体来说,意大利的评论家们很严肃地关心实用主义对普遍真理的否定。从文艺复兴开始,意大利哲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天主教的传统。而且,每当他们要从天主教出发,他们肯定无法完全让自己脱离它的影响。经验主义很少让意大利人动心。因此,经验方法一般来说会在意大利哲学传统中遇到很强的阻力。实证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曾有过短暂的胜利,但是它很快就被观念论潮流所淹没。当维科和黑格尔的学生克罗齐、詹蒂莱批判性地接触实证主义时,实证主义的理论弱点被暴露了出来,实证主义在他们的攻击面前束手无策。基于同样的理由,实用主义注定会失败。作为一种行动哲学,实用主义通过巴

比尼和普利佐里尼在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行动主义中到达了它的极限,而这种行动主义缺乏任何真理的标准,因此它变得认为除了自己以外,其他目标均毫无意义。这样一种消极的结果导致了人们对它产生了不满,以及对具有客观有效性的普遍真理的渴望,因而从普利佐里尼导向克罗齐的观念论,从巴比尼引向天主教,并且把瓦拉蒂和卡尔德罗尼与一种改进了的实证主义形式紧密相连。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已经“死”了,但它作为未来主义的艺术理论曾有过短暂的复苏。当未来主义也消失后,实用主义的各种痕迹都从意大利哲学家们的心中消失了,这些哲学家们今天在思考克罗齐,思考马克思,或思考梵蒂冈(或同时思考他们),假定每种情况下都有一个能达到的理想——它是普遍的、完美的并独立于个人的突发奇想。

关于实用主义,仍存在着一种不堪一击的、常识般的见解。根据这种见解,实用主义学说不过是一种商人的福音,一种断言有兑现价值的东西就是真实的,而“那无法回报”的东西就是虚假的理论。这种被归于实用主义的“面包和奶油”的生活观点被很多事实所反驳。在意大利,实用主义被拥护为一种获得更多精神性力量的手段。创办《列奥纳多》的计划在对一个画家的研究中常常被讨论,那些相较于实践行为,对美学的探究更感兴趣的画家、诗人、文人和梦想家是它的支持者。实用主义对他们来说不是商人的福音,而是对人类寻找精神力量、寻找比物质效用更高和更纯粹的价值指南。事实上,他们在实用主义学说中发现了很多理想主义的、美学的和宗教的感染力,它们能满足他们的抱负和梦想。深深地吸引巴比尼或普利佐里尼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的是,这个新学说的非理性的和美学的元素,它的个人主义方面以及它在与传统哲学体系的斗争中所展现出的一切有用的东西。他们更多地从尼采的角度而不是循着詹姆士的精神去接受实用主义。

不过,像实用主义这样一种复合的理论不可能在欧洲的哲学氛围中存活。在欧洲,太多的哲学家愿意被一种哲学的不宽容传统所统治,他

们的思维方式中也缺乏折衷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在一个理性主义的领地中不可能有经验主义存在的空间,在一个观念论的地方不可能有实证主义的空间。结果,他们拒绝接受那种在美国把所有彼此不同的元素组成在一起并形成了实用主义学说的观点。只有詹姆士的折衷思想,才能在一个宽容的精神中,在一个多种文化相遇并能在一起和平相处的土壤中,结合如此多样的元素——实在论、浪漫主义、观念论、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等,在一个实用的基础上接受康德和孔德、佛陀和基督、唯灵论和经验论、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然而,在欧洲思想家的眼中,宽容在社会中是好的,但在哲学中则是糟糕的。在哲学中,人们要寻找逻辑的关联,而不是寻求便利的集结。因此,在他们眼中,实用主义者是好人,但也是糟糕的哲学家。

[参考文献]

- [1][4]亨利·詹姆士·威廉·詹姆士书信集:第2卷[M].波士顿: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20:227,245-246.
- [2][5][6][7]乔瓦尼·巴比尼·巴比尼全集:第2卷[M].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出版社,1943:81,125,第十章.
- [3][10]威廉·卡德维尔.实用主义和观念论[M].伦敦:A&C布莱克出版社,1913:26.
- [8]圭塞普·普利佐里尼.逻辑学家的可悲[J].列奥纳多,1903(7).
- [9]圭塞普·普利佐里尼.一位发掘者的伙伴(F. C. S. 席勒)[J].列奥纳多,1904(6).
- [11]圭塞普·普利佐里尼.劝说的艺术[J].列奥纳多,1906(4).
- [12][13]乔瓦尼·瓦拉蒂.说谎者手册:评普利佐里尼的《劝说的艺术》[J].应用心理学评论,1907(2).
- [14][15]乔瓦尼·瓦拉蒂.心理生活作用的任意性[J].应用心理学评论,1910(5).
- [16][17]比利蒂托·克罗齐.实际的哲学[M].安斯利,译.伦敦:麦米伦出版公司,1913:35,304.
- [18]乔瓦尼·詹蒂莱.作为纯粹行动的心灵理论[M].威尔顿,译.伦敦:麦米伦出版公司,1922:76.
- [19]安东尼奥·艾利奥特.观念论对科学的反对[M].麦卡斯基尔,译.伦敦:麦米伦出版公司,1914:187.

[责任编辑:伍丹]